

# 從心理契約角度 看辛亥前後革命派的宣傳效果

羅福惠 李鳳鳳

---

**[提要]** 革命派在武昌起義前所做的大量宣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辛亥革命爆發時民眾的一呼百應之勢。但到兩年後的二次革命時，民眾卻持冷漠抵觸的態度。得民心者得天下，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二次革命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和民心變化相關。“民心”問題用現代社會心理學理論解釋則是“心理契約”問題，從心理契約角度來分析辛亥革命前後革命派的宣傳效果，有利於加深對辛亥革命的理解和認識。

**[關鍵詞]** 心理契約 革命宣傳 辛亥革命 二次革命

**[中圖分類號]** K257.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1 - 0175 - 08

---

20世紀初葉，報紙雜誌是主要的宣傳品，尤其是報紙影響面廣，發生的效力宏大，有人謂此時的新聞報導，可以“驅人於戰爭”<sup>①</sup>。革命派已經認識到“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眾響應，其於事何難焉。”<sup>②</sup>為了發動中等社會和下等社會支持革命，革命黨人採取以報紙為主體、靈活多樣的輿論宣傳活動。革命派的宣傳活動與武裝起義相輔而行，對辛亥革命起到了催生、促進作用。孫中山對革命宣傳的效用給以高度評價，他說“此次革命事業（按：指辛亥革命），數十年間，屢起屢仆，而卒睹成於今日者，實報紙鼓吹之力。”並說民國成立是“輿論之勢力與軍隊之勢力相輔而行，故曾不數月，遂竟全功。”<sup>③</sup>

“心理契約”（Psychological Contract）一詞最早是由美國組織行為學家阿基瑞斯（Argyris）在1960年所著的《理解組織行為》（*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一書中提出的，他指出在組織與員工之間，除了正式的書面的經濟契約之外，還存在著一種隱含的、非正式的相互期望與理解。之後，又有很多學者對其定義做了界定，大致都認為心理契約是組織與員工之間以僱傭關係為背景，以許諾、信任和知覺為基礎而形成的關於雙方責任的各種信念。本文引入“心理契約”理論，在尊重原有含義的基礎上，把心理契約置於革命派與民眾（文中又把民眾分為知識分子、勞苦大眾、工商界三個階層）兩者之中，分析革命派與民眾之間心理契約的建構與破壞

的過程，以研究革命宣傳的得失。

## 一、革命宣傳中的美好允諾

早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戰敗之時，孫中山就成立興中會，開展革命活動並開始了革命宣傳工作，指責清政府因循苟且、蒙昧無知、庸奴誤國，提出反對專制、“振興中華”、“建立合眾政府”。“興中會初期，文人墨士極感缺乏，所用宣傳工具，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及選錄《明夷待訪錄》內‘原君’、‘原臣’單行本數種”<sup>①</sup>。後來，隨著宣傳隊伍的壯大和宣傳內容的充實，其宣傳側重點也由歷史仇恨轉移到現實矛盾，以激發民眾的革命心理。

革命宣傳者抨擊統治者對內暴戾恣睢、荼毒人民，對外賣國求榮、引狼入室，指出官府的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官員的敲詐勒索緊隨其後，“地丁銀漕諸常稅外，而房稅、印稅、煙稅等項方日增”<sup>②</sup>。官吏“惟知封殖自肥於政府人民之間”，“盡其壓制人民之力以損下益上”<sup>③</sup>，使人民困苦不堪。鄒容號召漢族同胞“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sup>④</sup>劉師培專作《悲佃篇》，為佃農吶喊，指出佃農和傭工遭受地主的剝削壓迫，“至於禾穀既熟，按戶索租，肆求無藝，以擾其民，若輸稅逾期，則鞭箠之慘，無異於公廷，甚至奪其田廬，使之不得踐彼土，稍拂其意，則訟之於官，官吏畏田主之勢，必懲痛其身，或蕩產傾家而後止。”<sup>⑤</sup>黃侃作《哀貧民》，為貧民伸冤，他指出“搢紳之流，坐朝堂以為食人之政，郡邑首令，鞭笞敲撲以腴民膏血”。他呼籲貧民“非平之道，盍請命於天？殪此富人，複我仇讎，複平等之真”<sup>⑥</sup>，號召貧民起義，以恢復平等之權利。

民眾“處於水深火熱之時，政府官吏既不可望，而其愁苦慘憺之情又抑鬱而不可訴，乃以為欲去此社會之荼苦，必先建設新國家，欲建設新國家，不得不推翻舊政府，誅滅殘暴之君主，於是不得不出於破壞之一策。”<sup>⑦</sup>孫中山早在1897年就指出“今欲求避禍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sup>⑧</sup>孫中山的這一唯有革命才能救國的思路，被眾多革命宣傳者以不同的方式反復強調。具有革命傾向的《蘇報》認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捨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二法門也。”<sup>⑨</sup>革命黨人還對革命的宏大意義給予了新的詮釋。田桐把革命和自由、立憲引為同道，稱“流血者，自由之母也；立憲者，革命之產兒也。”<sup>⑩</sup>汪精衛把革命和民權相聯接，認為“惟有民權乃能革命，惟革命乃能民權立憲”<sup>⑪</sup>。章太炎認為革命是“補瀉兼備之良藥”，“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sup>⑫</sup>總之，因種族壓迫不可以不革命，因政府恣肆不可以不革命，因外人覬覦不可以不革命。革命由救國的手段之一上升到了唯一的手段，成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方法。

革命派在宣傳革命的必要和神聖的同時，也開始構劃革命後的美好圖景，向民眾作出種種美好允諾。1903年，鄒容在《革命軍》中向人民宣告革命後仿照美國建立民主共和國，在未來的“中華共和國”裡，無論男女都是國民，國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生命、言論、思想、出版等自由權利，要實行議會制，各府、州、縣選舉議員，各省議員公舉總統。在國際關係上，中華共和國與各大國平等，享有各種權利。革命宣傳者構劃的民主共和國既能給國民帶來無盡的幸福，又能避免西方國家出現的種種弊端。這是一個沒有貧困、沒有剝削、人人富足的理想社會，而且他們認為這個美好的理想在革命後是可以即刻實現的，這種對民主共和的構劃和宣傳是理想化的。

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理論作用於群眾心理，其中宣傳較多的部分將逐漸內化，作為新的社會觀念浸入人們的日常意識，形成一種不言而喻的社會心理。革命黨人利用報刊、雜誌、書籍及

各種活動廣泛宣傳革命及民主共和理想。“據不完全統計，到辛亥革命前夜，革命派創辦了40種以上的期刊，65種以上的報紙，其地域逐漸向內地擴展，勢力已達上海、奉天、哈爾濱、長春、廣州、汕頭、貴陽、開封、北京、武漢、西安等地。”<sup>⑧</sup>在電訊技術不發達的時代，書報雜誌等讀物在輿論導向上的作用重大，對社會心理的形成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因此，革命派與民眾在革命宣傳的作用下建立了心理契約。

革命派與民眾建立心理契約之後，革命風潮就一日千里地發展，使革命形勢日益成熟。革命救亡已經深入人心，革命黨也得到了人們的同情和支持，最後連極力反對革命的梁啟超也不得不承認“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於國中，今則得法理論、政治理論以為之羽翼，其旗幟益鮮明，其壁壘益森嚴，其勢力益磅礴而鬱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sup>⑨</sup>因此，在革命宣傳下，民眾趨同革命的大眾心理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礎。

## 二、民眾響應和支持革命

武昌起義一聲炮響，給中國各階層帶來了希望，各地民眾紛紛出資出力幫助革命軍對抗清軍。

辛亥革命的爆發使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倍感鼓舞。在紹興府中學堂教書的魯迅在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紹興時，被推舉為慶祝大會的主席，他發動學生遊行，到街頭宣傳革命，這次革命在魯迅的心中引起了無限光明。他後來回憶說：“那時確是光明得多”，“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sup>⑩</sup>梁漱溟在辛亥革命爆發後加入了京津同盟會，不顧家人反對，剪去了辮子，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國報》的外勤記者，積極為革命服務。郭沫若後來回憶四川獨立時的心情說：“我們最大的喜興是等不到獨立的宣佈，在頭一天晚上便把辮子剪了。”並高呼“萬歲！革命成功萬歲！只消大家把頭上的毛辮子一剪，從此以後，中國就可以一躍而為世界上天字第一號的頭等強國了。”由此可見在“革命成功了的當時，我們一般的人是怎樣的歡欣鼓舞。”<sup>⑪</sup>

辛亥革命也得到了以工人、城市貧民和農民為代表的勞苦大眾的支持。在湖北革命中，“三鎮之民，對於革命同志、革命兵士真是簞食壺漿以迎。革命軍在前方打仗，不需預備軍糧，人民按日送飯。至於運輸各職務，不需軍務，由人民自行運到。若有所需，無不立時供應，從無有自私自利者。”<sup>⑫</sup>上海發生革命時，油豆餅業決議“按照繳納釐金之數，九折抽餉”<sup>⑬</sup>；上海木行業在樹木捐已廢除的情況下，為助餉而自覺“參照從前樹木捐章程，減去二成，按月匯解”<sup>⑭</sup>；紗廠工人自願將每月所得薪俸，“按十成之一助餉，以軍事平靖為止”<sup>⑮</sup>。廣東光復時，人們熱情高漲，廣州“城廂內外各商店，均高揭三色國旗，有書‘中華民國萬歲’者，有書‘新漢萬歲’者，有書‘民國軍萬歲’者。爆竹如雷，歡聲響動，剪髮者尤眾。”<sup>⑯</sup>廈門光復佔領道台衙門時，“哨笛一鳴，同盟會會員領先，幾千個群眾列成長蛇隊，浩浩蕩蕩向目的地挺進。沿途加入的人很多，肩摩踵接，陣容更見雄壯。”<sup>⑰</sup>民眾支持革命之熱烈在此顯露無疑。

工商界也是積極出資出力贊助革命軍。武昌起義時，上海商界趙貢芝、張雨若等六人捐助軍餉銀二千四百元，由趙親自送到武昌軍需科繳納。<sup>⑱</sup>上海商界頭面人物虞洽卿為策動江蘇巡撫程德全響應革命，親自前往蘇州力勸，並籌集一百萬兩銀子作為反正後的軍餉，程德全在革命輿論的壓力下，於上海光復次日宣佈江蘇獨立。鎮江商人相繼組織鎮江國民輸送軍糧聯合會、節費助餉會、售物助餉會等支持革命軍。<sup>⑲</sup>張謇也對籌集軍餉極為積極熱心，他先以江蘇省議會的名義送牛五十頭、酒千瓶，繼以海通實業公司的名義送面千袋、布千匹犒賞攻克南京的江浙聯軍。<sup>⑳</sup>

助餉商人還勸告其他商民，“國民軍既有以保全商民之生命財產，我商民應如何歡欣鼓舞以贊助之，贊助之道籌餉真首要也，敬告商民助餉毋落人後。”<sup>⑧</sup>可見各地工商界捐助軍餉之熱心。

當時在輿論界有相當影響力的《申報》通過觀察人心向背，認為天下人心大都傾向革命：“我嘗觀之今日之齊民矣，學界青年強半革命。其一般平民久憔悴於虐政之下，飢聞革軍之文明，幾乎有奔走恐後之勢，蓋人人心目中，俱懸一政治革命之目的者，非一日矣。”<sup>⑨</sup>《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在發往英國的信中（1911年10月17日）寫道：“我遇到的任何人，不論是中國人還是中國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訴我，他們希望革命成功。”<sup>⑩</sup>外國記者私下接觸到的民眾所表露出來的群體意向，更能說明社會心理的真實狀態。

### 三、從高度期望到漠視抵觸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新建立的中華民國承擔著廣大民眾的熱切期盼。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民眾發現自己的生活並未改善，中華民國有名無實，革命派的種種美好承諾只是畫餅而已，人們的希望破滅，憧憬顯得渺茫，開始陷入悲觀失望的心理狀態中。

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革命前積極宣傳支持革命，但在革命後對新政權未能達到民主共和的理想而倍感失望。魯迅在紹興光復的第二天要去看看街區新貌，結果他看到的是滿街都掛著表示歸順的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sup>⑪</sup>。他說中華民國“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sup>⑫</sup>這種失望悲觀的情緒並非魯迅所獨有，在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中都有極明顯的體現。梁漱溟作為《民國報》的外勤記者，出入於各式政黨團體本部，耳聞目睹了政治中的勾心鬥角和黑暗之事，對革命感到失望。他說：“作新聞記者生活約一年餘，連參與革命工作算起來，亦不滿兩週年。在此期間內，讀書少而活動多，書本上的知識未見長進，而以與社會接觸頻繁之故，漸曉得事實不盡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兇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於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sup>⑬</sup>他在失望悲憤之餘，兩次企圖自殺。郭沫若也消沉頹廢起來，在成都足足過了一年半的“自暴自棄的肉麻生活”<sup>⑭</sup>。李大釗在1913年4月作《大哀篇》，對革命派宣傳的民主共和、三民主義未能兌現十分憤慨。他說，所謂共和不過“徒炫耀其名，以賈吾民之歡心已耳”；所謂民政，不過是“少數豪暴狡獪者之專政，非吾民民主之政也”；所謂民權，不過是“少數豪暴狡獪者之竊權，非吾民自得之權也”；所謂幸福，不過是“少數豪暴狡獪者掠奪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並痛言“今理想中之光復佳運，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末無聞，政俗且愈趨愈下，日即卑污，傷心之士，安有不痛憤欲絕，萬念俱灰，以求一暝，絕聞睹於此萬惡之世也。”<sup>⑮</sup>這充分顯示出知識分子對革命派宣傳的民主共和的美好許諾未能兌現的痛苦欲絕之情。

勞苦大眾的生活狀況在革命後毫無改善，也令他們頓失所望，且其不滿首先是從捐稅問題開始的。因革命者曾大力宣傳，革命後“凡租稅釐捐一切不便於民者，悉掃除之”<sup>⑯</sup>。但革命成功之後，也只是象徵性地免征賦稅，實際上不可能落實，如廣東軍政府建立之初宣佈豁免了各種捐稅，但不到一年，“都督通告，暫照舊章徵收，其丁米一切陋規，悉令化私為公”<sup>⑰</sup>。其他各地也是先下廢除惡稅令，然後再下徵收令。地主的田租剝削問題也未解決，因此民眾的負擔並沒有因此而減輕。在悲觀失望之餘，農民就採取措施維護自己的利益。上海、青浦、奉賢、南匯、松

江等縣紛紛出現佃農的抗租鬥爭，此起彼伏，影響極大，以至於《申報》把鄉民的抗租鬥爭作為1912年初迫在眉睫的一大隱患，“聞此次鄉民之抗租，並不以年歲之豐歉為藉口，而惟一意以全租蠲免相要挾，大致謂民軍光復，凡滿清苛稅蠲除不少，租稅同一性質，自必一律豁免。……此唱彼和，群起盲從，一日復一日，風聲所播，遂成今日之現象。”<sup>⑧</sup>上海、江蘇、福建、貴州等地都出現了抗捐抗租風潮。工人也紛紛發動罷工鬥爭，要求增加工資。上海成為工人罷工的中心，“木工、女工、墨工、糞工罷之於前，今且有信殼業、老虎灶要求於後，雖罷業之性質不同，而其迫於生計之艱難則一也。”其他各地的罷工也是此起彼伏，以至於“今日之中國一罷工之中國也，行政界、立法界、司法界既多以罷工為對付之策。”<sup>⑨</sup>當時的報刊感嘆：“近數日來工界風潮迭起，或則要求加給工價，或則要求維持生計，甚者且以罷工為挾制之舉，亦可見勞動界生計之艱難矣。”<sup>⑩</sup>由此可見，以農民、工人為代表的勞苦大眾在民國初年的艱辛生活。

工商界助餉籌糧支持革命，無疑是包含著巨大的收益期望的，但新政權在內外壓力下極不穩定，令工商界大失所望。在秩序混亂、盜匪橫行中，各地的商業蕭條，呈現一片衰敗景象。蘇州工商業不振，以至於其中百餘家店鋪聯名通告房主，請求酌減房租，希望以六成付租金，並集中開會以期達到目的，“亦可見蘇地市面之衰矣。”<sup>⑪</sup>1912年6月，川路駐宜昌總理李稷勳對全國的混亂局面感嘆不已：“今國旗五色，飄揚大地，而吾蜀傷痕滿目，元氣凋瘵，川路倉卒停歇，工材散落，虧蝕尤鉅。”<sup>⑫</sup>流露出他對民主共和的失望之意。張謇也說：“民國成立以來，垂及一載，民生痛苦，倍於昔時”<sup>⑬</sup>，並且表現出對革命黨人的不滿。廣東光復半年後，當時的報紙感慨道：“萑苻遍地，有翼難出生天；荊棘載途，插足幾無淨土”；“七十二行，行行虧折；三千萬戶，戶戶淒涼”<sup>⑭</sup>，雖不免有誇大之詞，但或多或少反映了革命後工商界的普遍感受。

人們在辛亥革命爆發時所看到並賦予高度期望的一線光明，還未來得及普照大地就熄滅了，他們的希望化為泡影，革命派與民眾的心理契約遭到破壞。心理契約遭到破壞和違背（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之後，“會產生一種短期的相對激烈的情緒或感情反應，比如失望、悲痛、憤怒等。”<sup>⑮</sup>而且這種悲觀失望情緒有一個蔓延擴大的過程，最先感到失望的是對革命寄希望最大、最敏感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數是革命救國的忠實信徒和積極鼓吹者，在革命爆發後紛紛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希望通過革命可以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共和國，但是有名無實的民國令他們頓覺失望；然後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急於改善生活狀況的勞苦大眾，他們把革命視為自己的救星，但革命後依然是困苦不堪；最後是期望獲得商業收益的工商界，由於革命後政局不穩、社會動盪，也使他們大失所望。這種失望悲觀情緒，首先在個體小範圍內產生，後來逐漸蔓延到整個組織、群體之中。人們的情緒被失望所感染，情緒感染是指“一個人不自覺地，不由自主地對別人的情緒影響的接受”，即“一個人在別人的情緒影響之下，產生同別人一樣的情緒狀態”，它“能使人羣之中一個人的情緒狀態蔓延到其他成員”。<sup>⑯</sup>辛亥革命後，人們的失望情緒在情緒感染的作用下瀰漫全國，成為群體性的普遍心理特徵。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此後發起二次革命。在普遍失望的心理籠罩下，民眾對革命由初感失望轉變為極度失望，對二次革命採取漠視抵觸的態度。

大部分知識分子認為二次革命是擾亂社會秩序、破壞民國，對此持反對態度。宋案發生後，著名記者徐血兒於4月27、28、29日連續在《民立報》上發表《綜論大暗殺案》，對宋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國會當依據約法，提出彈劾案，使袁、趙解職，由國民組織特別法庭，為公正之審判，以為此案最後之解決也。”<sup>⑰</sup>他反對武力解決，主張依據約法和平解決。李大釗在同年6

月首先責怪“皖贛湘粵，岸傲自雄，不待宋案發生，借款事起，始有離異之跡”，勸告革命黨人放棄使用武力“開誠佈公，雍容揖讓，赦吾四億同胞之蟻命”<sup>⑧</sup>與袁世凱進行合法的政治鬥爭，表明他不贊成袁世凱濫用暴力，但更“恐泰半之豪暴，或且烈於專制之一人也”<sup>⑨</sup>，即認為革命之暴烈比一人之專制危害更大。徐血兒和李大釗的態度代表了知識分子中多數人的態度，他們不願看到剛剛建立的民國再遭受戰爭之苦，呼籲雙方和平解決。

勞苦大眾對二次革命也持漠視抵觸的態度。在二次革命爆發前夕，革命派做民眾動員時，“一般普通人則以其中含有黨見，均不深信兩方面之言。”<sup>⑩</sup>所以二次革命時，貧苦工人除了為改善自身經濟狀況而在少數地區舉行過幾次行業性罷工之外，幾乎沒有表現出政治鬥爭的熱情，農民則更缺乏熱情，即以當時規模較大的白朗起義而言，也完全是農民因貧苦而鋌而走險的拉杆起事。

工商界的態度更與辛亥革命時判若兩人。1913年5月初，二次革命還在醞釀時，上海工商界就表現出極度抵觸的情緒。上海總商會聲稱對革命派的行動“殊難緘默”，並懇請“大總統、國務院、參眾兩議院、各省都督、民政長以保衛商民、維護秩序為宗旨，無使我商民喘息餘生，再罹慘禍，坐致大局淪胥，貽革命豐功之玷。”<sup>⑪</sup>陳其美在上海發動討袁起義時，曾兩度訪問當地紳商領袖李平書，希望他能像支持辛亥革命一樣支持二次革命，但是一再遭到拒絕，後來李平書坦白地說：“今年之事，地方不贊同，非上年可比。上年保衛治安，地方戴德，今慎勿輕舉妄動，使之反德為怨，致以後無從辦事。”<sup>⑫</sup>南京宣佈獨立之後，討袁軍派代表請求商會“勸令商界助餉”，開始“商會雖未反對，惟無辛亥革命助餉之熱心耳”<sup>⑬</sup>，但隨後南京商會竟然面見韓恢、何海鳴等人，“勒令讓城，願付鉅款以酬”<sup>⑭</sup>。在江西，討袁軍潰敗後，“北軍乃長驅入城，城內居民大為歡悅。”<sup>⑮</sup>在貴州，“貴陽商民聞官軍戰勝亂軍（按：指討袁軍）消息，大為欣慰。”<sup>⑯</sup>在廣東，“當日除國民黨人助逆外，全體商界均反對獨立，無一人與聞逆謀”<sup>⑰</sup>。

二次革命以失敗而告終，其原因除了軍事實力對比懸殊外，民心的轉向為背是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革命志士吳玉章說：“二次革命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失敗，根本的原因在於自辛亥革命以後，國民黨就已經放棄了革命綱領，逐漸地脫離了群眾，因此，它發動的反袁鬥爭，再不像同盟會時代那樣能夠激起群眾的熱情了。”<sup>⑱</sup>陶菊隱也說，“黨派之爭再加上區域之爭，把湖南政界鬧得烏煙瘴氣，因此湖南人民對革命產生了悲觀失望的心理，後來二次革命時期，湖南人民認為又是國民黨與袁世凱的權利之爭，而不再支持國民黨了。”<sup>⑲</sup>由於革命派與民眾的心理契約遭到破壞，民眾不再相信革命派的言論，二次革命在民眾看來只是不同派別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沒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更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無關，因此對此持冷漠旁觀的態度。

#### 四、結語

辛亥革命爆發時，各個階層在心理契約支配下參與並支持革命，正如章開沅先生所說：“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革命者，在動員人民投身與支持革命的歲月裡，確曾不斷做出種種美好且不切實際的許諾，仿佛革命是萬靈神藥，一經勝利立刻便會結束所有的腐敗與痛苦，帶來無限的光明與幸福。現在既然已經推翻清朝，建立民國，人民就有理由要求革命者實現諾言，很快給予他們所曾殷切期待的革命美果。”<sup>⑳</sup>但在革命後，革命派未能兌現美好允諾，心理契約遭到破壞，民眾就產生了悲觀失望情緒，在二次革命時對革命派採取漠視抵觸的態度。

革命宣傳集十年之功，從積累、發酵，以成辛亥革命時一呼百應之勢，助成了舊王朝的推翻和新政權的產生，但在革命後兩年之內，其宣傳效應立即直線下降，以致革命派在二次革命中節

節敗退。由此可見，革命或重大改革前的宣傳內容要建立在科學的理論研究和可能付諸實踐的基礎上，同時還要對革命或改革的艱巨性、複雜性有所認識和宣傳，使民眾有應對現實困難而長期奮鬥的心理準備，以保持心理契約的持久有效。如果只是片面地強調革命或改革的速效和幸福，而不講明革命或改革必然要付出的代價，當現實不如群眾的心理預期時，他們難免會把以前的革命宣傳視為烏托邦或謊言。

- 
- ① Elihu Katz & Paul F. Lazarsfeld,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1955, p16, 轉引自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第42頁。
- ② 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8頁。
- 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36～337頁。
- ④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頁。
- ⑤ 侯生：《哀江南》，東京：《江蘇》，第1期。
- ⑥ 辨姦：《粵東商民與岑春煊》，東京：《民報》，第3號。
- ⑦ 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9頁。
- ⑧ 韋喬（劉師培）：《悲佃篇》，東京：《民報》，第15號。
- ⑨ 運覽（黃侃）：《哀貧民》，東京：《民報》，第17號。
- ⑩ 韓孫：《露西亞虛無黨》，東京：《江蘇》，第4期。
- ⑪⑫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73、317頁。
- ⑬ 《敬告守舊諸君子》，上海：《蘇報》，1903年5月13日。
- ⑭ 張柎、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第551頁。
- ⑮ 精衛（汪兆銘）：《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東京：《民報》，第4號。
- ⑯ 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04頁。
- ⑰ 劉泱泱主編：《辛亥革命新論》，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123～124頁。
- ⑱ 與之（梁啟超）：《論中國現在之黨派及將來之政黨》，橫濱：《新民叢報》，第92號。
- ⑲ 魯迅著：《魯迅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366頁。
- ⑳㉑ 郭沫若著、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編輯：《沫若文集》（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243頁；第297頁。
- ㉒ 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8頁。
- ㉓ 《油豆餅業議助軍餉》，上海：《申報》，1911年11月25日。
- ㉔ 《木業之熱心》，上海：《申報》，1911年12月5日。
- ㉕ 《紗業同人公啟》，上海：《民立報》，1911年12月6日。
- ㉖ 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1～232頁。
- ㉗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編：《福建文史資料》，第六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5～116頁。
- ㉘ 《商界熱心捐助軍餉》，上海：《申報》，1911年11月16日。
- ㉙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2～625頁。
- ㉚④ 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館編：《張謇全集》，第一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94～195頁；第246頁。
- ㉛ 《海上閒談》，上海：《申報》，1911年11月7日。
- ㉜ 《嗚呼今日之人心》，上海：《申報》，1911年

10月24日。

③①[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卷），劉桂梁等譯，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762頁。

③②魯迅著：《魯迅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452頁。

③③魯迅著：《魯迅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37頁。

③④梁漱溟：《我生有涯願無盡：梁漱溟自述文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5頁。

③⑤④⑤李大釗著：《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47頁；第35、39頁；第42頁。

③⑥廣州：《廣東公報》，第14號（1912年8月14日），轉引自邱捷：《清末民初地方政府與社會控制——以廣州地區為例的個案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

③⑦《論鄉民抗租風潮》，上海：《申報》，1912年1月3日

③⑧《工界之隱憂》，上海：《申報》，1913年3月18日。

③⑨《工界生計問題》，上海：《申報》，1913年3月11日。

③⑩《蘇州通信》，上海：《申報》，1912年2月3日。

③⑪李一：《荊宜施鶴光復記》，《辛亥革命》（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8頁。

③⑫《商民叫苦文》，廣州：《民生日報》，1912年7月18日，轉引自邱捷：《清末民初地方政府與社會控制——以廣州地區為例的個案研究》。

③⑬ Morrison E W, Robinson S L., *When employees feel betrayed: A Model of how 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 develops*, New Y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7, 22, pp. 226-256.

③⑭張德：《社會心理學》，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90年，第52頁。

③⑮《縱論大暗殺案》，上海：《民立報》，1913年4月29日。

③⑯《普通人之輿論》，上海：《申報》，1913年5月11日。

③⑰《總商會電請維持秩序》，上海：《申報》，1913年5月8日。

③⑱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2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頁。

③⑲《癸丑禍亂紀略》，轉引自章開沅：《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3頁。

③⑳《寧軍都督復易人》，上海：《申報》，1913年8月30日。

③㉑《南昌電》，上海：《申報》，1913年8月21日。

③㉒《貴陽電》，上海：《申報》，1913年8月31日。

③㉓《商董不以少數居功》，廣州：《華國報》，1913年12月11日，轉引自邱捷：《清末民初地方政府與社會控制——以廣州地區為例的個案研究》。

③㉔吳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68頁。

③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二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199頁。

③㉖章開沅：《辛亥前後史事論叢續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53頁。

**作者簡介：**羅福惠，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李鳳鳳，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武漢430079

**[責任編輯 陳志雄]**